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德] 伊曼努尔·康德

对“什么是启蒙” 的回答

[英汉双语]

这种启蒙所需要的是

自由。

这种

自由

是所有自由形式中最没有恶意的。这种

自由

是让公众在所有事物中运用思考力。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

(英汉双语)

[德] 伊曼努尔·康德 著

[英] H.B. 尼斯贝特 英译

肖树乔 汉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英汉对照/(德)康德著；肖树乔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11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4349-9

I. ①对… II. ①康… ②肖… III. ①康德—I.—1724~1804—
哲学思想—启蒙主义—研究—汉、英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076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7260 号)

Penguin Books Ltd, Registered Offices: 80 Strand, London WC2R 0RL, England
www.penguin.com

This selection first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09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ranslation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pieces in this collection taken from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H. S. Reiss
and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359287; 68359303 (发行部); 68359725 (编辑部)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 址/http://www.ctph.com.cn

出版策划/张高里

责任编辑/胡晓凯 范祥镇

装帧设计/张佩瑶

排 版/竹叶图文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60毫米×940毫米 1/32 印 张/7.25

版 次/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6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4349-9 定价: 22.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译出版社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鵝《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梓八十种，尚有二十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二百万册，在全球众多读者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久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十分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这样，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陷：每位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形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以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显而易见。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来——托马斯·潘

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许多国家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其影响难以估量；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或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久远，但其中的话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域不同，收录的作家亦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或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恶，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判明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可以从阅读这些杰作中获得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译者导读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思想家、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哲学，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诸多流派，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康德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核心的著作合称“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本哲学著作的问世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诞生的真正标志。

康德一生的研究涉猎广泛，对自然科学、美学、神学、巫术等都有研究，但有一个问题是一直贯穿其中的，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研究以 1770 年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而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前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1755 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后期的研究成果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大批评”。

本书收集的是他后期的四篇作品，即《对“什么

是启蒙”的回答》(1784年)、《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素描》(1795年)、《回答“人类是否在持续地改进”问题的新尝试》(1797年)、《关于人类历史开端的猜想》(1786年)。

在《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中，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启蒙是人类从其自我导致的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为什么即使大自然早就把人类从远距离指导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仍然有大量的人保持着不成熟的状态，他得出的结论是：懒惰和怯懦。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成为了一种惯性。康德指出，要使公众得到启蒙，最为需要的是自由，是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运用又分为个人运用和公开利用。理性的个人运用是一个人在其被委任的职位或工作中对自己理性的使用。理性的公开利用是臣民们公开运用他们的理性，将他们更好地起草法律的想法公之于众。康德认为，只有自己已经启蒙并且拥有一支能够保障公共安全的军队的统治者才会允许公众理性地思考，而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允许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对于政府是有益的。

《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素描》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篇有深远影响的论著，其中提出的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的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论文分两部分阐述了康德关于国际社会保持和平的法哲学理论。第一部分是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用六项条文鼓励缔结和平条约，并

以和平条约为依据逐步使常备军无用武之地，从而达到废除常备军的目的。第二部分是国家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提出建立共和制的市民宪法和以联邦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康德期望以共和制国家的联合以实现国际社会的永久和平。他提出的国际永久和平的思想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国际法和外交准则。

在《回答“人类是否在持续地改进”问题的新尝试》中，康德探讨了“人类文明史是如何发展的”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进步的历史必须以某种经验为起点。人类的进步是某个事件发挥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而这个事件是指被自然权利所规定的宪法的演进，即一个共和制的宪法。人们所渴望的国家的实际形式可能是共和制，或者它可能只是在治理模式上是共和制的。

康德预言人类会实现这一目标。而要做到世界不断地改进就要进行大众的启蒙，公开地教给人民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一旦一个共和制的宪法被制定出来，它就最有权威阻止战争，当权者会越来越少地使用暴力，而越来越多地遵从法律。这最终会延伸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外部关系上，直至一个世界公民社会的建立。当人类不断前进时，人的善行会更多，这就是人类能获得的好处。

在《关于人类历史开端的猜想》中，康德阐述了对历史、人性及人类社会的看法，这可以看作是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部分。在这篇论文中，康德猜想了人类自由的最初发展史并给出了一个优美的诠释。人类起初只有

动物性的本能，他必须靠本能的指引，听从上帝的命令。第一步是理性的促动，把饮食知识扩大到本能的限度之外。第二步是理性很快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并且寻求超越本能的界限扩大食物的知识，这标志着理性驾驭了冲动的意识。第三步反映在对未来的预测上，这是人类优势的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具有了这种预见性，人类能够为长远的目标做好准备。但是由于这同样的能力，当人类预见到不确定性时，会产生最无穷无尽的担心和焦虑。第四步，人类意识到人才是大自然的真正目的，地球上没有谁能与其抗衡，因此可以把动物看成手段和工具，但是人人平等，人不能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其他的人，而应当把他们看作能平分大自然礼物的人。在对人性考察的基础上，康德看到了恶的手段背后隐蔽的善的目的。

康德的作品以晦涩难懂而著称，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其他译者的翻译文本，力求做到语言上清楚明白，希望能以此来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若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译者导读	I
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	1
永久和平：一个哲学素描	9
回答“人类是否在持续地改进”问题 的新尝试	49
关于人类历史开端的猜想	63
注释	77

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

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它的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

即使大自然早已把人类从远距离指导的桎梏中解放，懒惰和怯懦使很多人依然快乐地保持着不成熟状态；同样的原因，一些人很容易自命为另一些人的守护者。保持不成熟状态是如此方便：如果有一本书代替我理解，一个精神导师指导我的良知，一个医生评判我的饮食等等，我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只要金钱能够解决的，我就不需要思想；其他人很快就能替我做这些累人的工作。那些好心接过指导工作的守护者不久就发现，太多的人，不分性别，认为迈向成熟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相当危险。这些守护者起初为这些驯化了的动物所着迷，小心翼翼地防止其越雷池一步。他们下一个策略就是展示危险，使其不敢尝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行走；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一定会在摔过几次跟头之后最终学会走路。但是，这样的例子具有恐吓性，通常会吓得他们不敢再尝试。

然而，让每一个个体找到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路十分困

难，不成熟状态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特征。他们甚至变得喜欢这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得再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因为他从未被允许做出这种尝试。规章和程式，这些合理使用或者说是误用他天资的机械工具，就是对他永久性不成熟状态的禁锢。倘若有人扔掉这些枷锁，他依然会不确定是否能够跃过甚至是最窄的壕沟，因为他不习惯这种自由运动。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头脑训练成功地脱离这种不成熟状态，继续大胆前行。

相比之下，公众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自我启蒙。倘若公众被赋予了自由，他们的自我启蒙的确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总会有少数人独立思考，他们甚至存在于被指定为大众的守护者中间。这些守护者一旦扔掉不成熟状态的枷锁，就会传播尊重个人价值、尊重人人需有独立思考之责任的理念。这样做引人瞩目的一点是，如果之前被守护者锢入枷锁中的公众被唤醒，或许最终会迫使守护者自己留在枷锁中。宣传偏见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偏见最终会报复到最初宣扬它的人的身上。因此，公众只能慢慢获得启蒙。一场革命或许能够结束独裁暴政与强权压迫，但是它从不会带来真正的思想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偏见，如同它们所取代的旧观念一样，成为掌控缺乏思想自由的大众的枷锁。

对于这种启蒙而言，它所需要的只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所有自由形式中最没有恶意的，即在所有事情上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但是我听到各方在说，不要争辩！军官说，不要争辩，列队行进；税务官说，不要争辩，交税；

神职人员说，不要争辩，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个统治者说，想怎么争辩就怎么争辩，想争辩什么就争辩什么，但是，服从！）。这些都意味着对自由无处不在的限制。但是哪种限制阻碍启蒙，哪种限制不但不阻碍反而促进启蒙？我的回答是：人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必须总是自由的，这本身就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理性的个人运用或许常常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并不会过度地阻碍启蒙的进步。我所谓的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像一位学者向读者大众阐述观点那样对自己理性的运用。而理性的个人运用，我把它定义为，一个人在其被委任的职位或工作中对自己理性的运用。

在一些关乎公众全体利益的事务中，我们需要一定的机制，在此机制下，一些成员必须完全服从调配，这样他们才能通过一份人为的共同协议，为政府雇用而服务于公共利益（或者至少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争辩当然是不被允许的，顺从是必要的。但是，作为机器零部件的单个个人而言，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公众甚或世界社会的一员，那么就像一位学者通过写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向公众阐述观点一样，他或许的确能做到一边争辩，同时又不妨害自己所受雇从事的事务。然而，如果一个从上司那里领命的军官在执行时公开质疑这一命令的适当性或者有用性，后果是非常有害的。他必须完全地服从命令。但是，我们无法禁止他像学者一样对军事事务中的错误进行观察，也不能禁止他将他的观察公之于众以供评判。公民不能拒绝缴纳税赋。一个被通知纳税的人，对于这些税赋自以为是的批评，会被当作导致抗命的暴行而

受到处罚。然而，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博学的个体，公开地阐述这类税赋措施的不恰当甚至是不公平，并没有违反其公民责任。同理，一个受雇于教堂的神职人员有责任根据其所服务教堂的相关教义指导他的受众。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完全有自由也有责任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善意地将这些教义的谬误之处公之于众，同时为更好地组织宗教和教会的相关事宜提供建议。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对良心的拷问。作为一个教会的积极服务者，他在履行职责时所教授，并由他呈现出的，就是他职务的一个结果，是他被雇来用一种指定的方式和以其他人的名义而宣讲的。他会说，我们的教会教这个和那个，这些就是教会所引用的论据。然后，他尽量从自己都无法完全信服的戒律中找寻出更多的实际价值。而这些戒律事实上也包含着真理，因此他能够加以阐释。无论如何，在这些教义中没有与宗教本质相悖的内容。如果神职人员认为在这些教义中存在违背宗教本质的内容，他就不会心安理得地履行其职责，就会辞职。然而，这种理性的运用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因为教区无论多大都只不过是私人聚会。这样看来，作为牧师也不会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在履行外界赋予的使命。与此相反，如果作为一个用作品感染公众（例如，整个世界）的学者，一位公开运用理性的神职人员应当享受无限的自由，能够自由表达，否则就等同于说人们精神世界的守护者本身不成熟，而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并且永远是荒唐的。

神职人员团体，例如一个教会法院或者是教务评议会，是否应当宣誓对不可改变的信条负有忠实义务，以

确保全天候地为其信徒进而为其他人提供监护？我的回答是，这不可能。这种旨在永远阻止人类的启蒙而订立的契约，即使它由最高权力机构、神圣罗马帝国国会或最庄严的和平条约所认可，也完全没有法律效力。一个时代不能通过誓约将下一个时代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使其无法拓展和修正知识，特别是在像启蒙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寻求进步。这是违反人性的犯罪，因为人性的原始目标正是在此方面取得进步。后代人因此完全有权利将这些协议看作是毫无权威并且是犯罪而摒弃它们。检验一项具体措施能否成为法律，我们只需看一个民族是否将这项法律施加于自身；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之前，这也可作为在某个特定的短暂时期内引进一项制度的方法。这也意味着每个公民，特别是神职人员，会被给予像学者一样在其著述中公开评论现行制度不足的自由。与此同时，这项新制度会继续存在，直到公众对于这些事物的看法有所进步，一致同意通过一项议案提交给国王。这是为了保护那些有更深刻认识的会众改变其宗教信仰，但并不会阻碍那些希望维持原状的会众。终其一生皈依一个没有人可以公开质疑的宗教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这会抹杀人们进步的一个阶段，因此对后代是毫无益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人自己或许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在应当知道的事物上延迟启蒙；但是完全放弃这种启蒙，不管是为其个人还是为其后代，都意味着侵犯和践踏人类神圣的权利。但是人们不愿意强加于自身的东西，更不会被统治者所强加，因为统治者取得立法权力正是靠汇集人们集体意愿于他一身。只要他看到